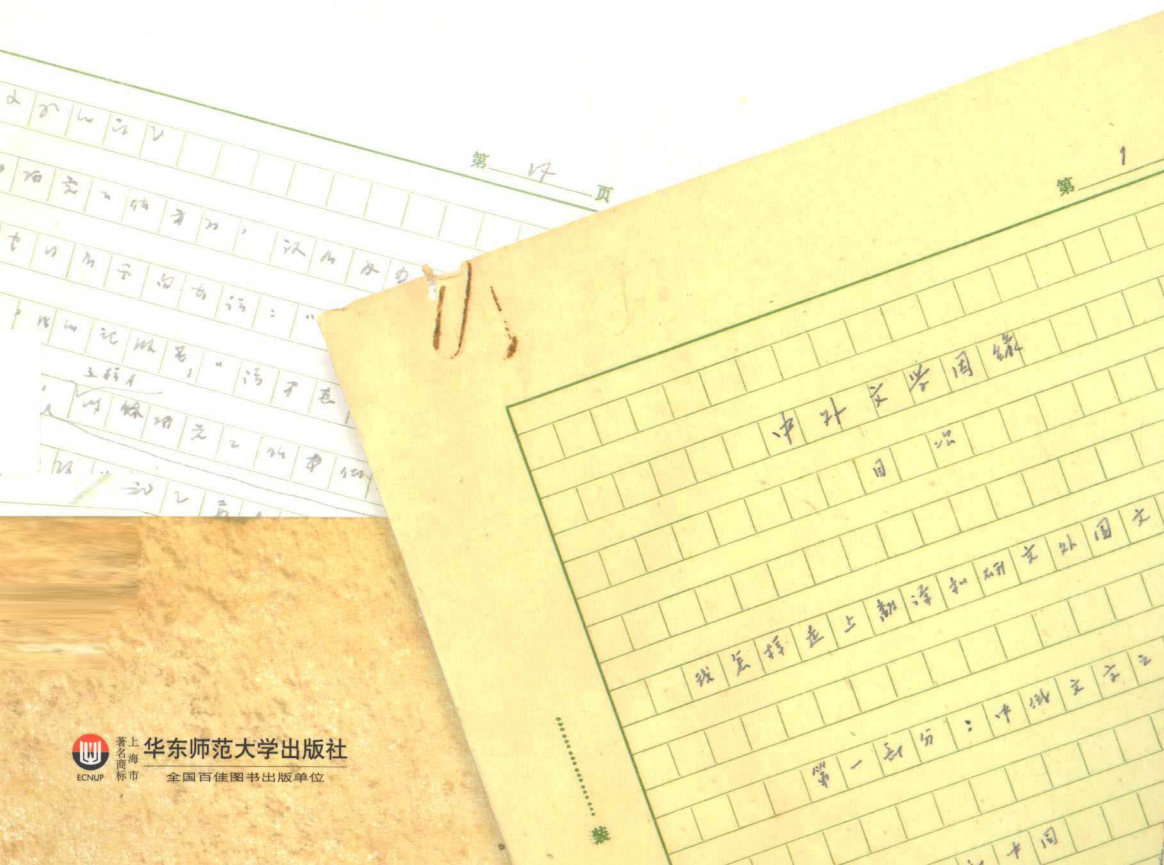


# 中外文学因缘

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戈宝权◎著



# 中外文学因缘

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戈宝权◎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戈宝权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75-0579-7

I. ①中… II. ①戈… III. ①世界文学—比较文学—文  
学研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566 号

## 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

著 者 戈宝权  
图书策划 社项目部  
责任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余 强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4  
印 张 38  
字 数 64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579-7/I·967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戈宝权先生  
百年诞辰纪念

高莽  
  
題

# 我与父亲

戈小丽

2013年2月15日是爸爸戈宝权的百年诞辰。爸爸的生平和光辉业绩,已载入国史和文化外交文献,无须我赘言。在深深缅怀他的同时,我仅就他爱书藏书,学而不厌的一些生活细节写成小文,作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和出版这本书的前言。感谢为出版这本书的华东师范大学给与全面帮助与支持的女士和先生们。

在很多媒体上都看到对爸爸讲公振爷爷送他积木的故事的转载。那是在爸爸童年时,公振爷爷送他一盒积木,爷爷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了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我不仅是字面的故事,也是声音的故事,是一生未学好普通话的爸爸用东台话讲的。这故事我听了很多遍,爸爸在讲它时充满对公振爷爷的挚爱和怀念,也是在不断回忆他自己走过的路程。他嘱咐我从小就要遵循这个故事的精神,积累我造房子的“砖头”。

戈公振(名绍发)1890年11月27日出生在东台县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一生勤奋好学,是中国二三十年代著名记者、中国报业史研究的奠基者和新闻教育家。我的亲爷爷戈绍甲(号曙东),是民国时期东台县教育局局长。公振爷爷是我曙东爷爷的二弟,也就是说公振爷爷是我的叔爷。由于公振爷爷的名声加之后来爸爸的名声,人们总是把他们联起来,说公振是我爷爷。“文革”后,我们终于找到早年移居美国的公振爷爷的独子戈宝树(著名核物理学家)。宝树叔说,说是你亲爷爷也没错呀,你爸爸是过继给我爸爸的。公振爷爷年青时致力于新闻事业,很晚才结婚,三十岁才喜得贵子。当时他的事业蒸蒸日上,需要有一个已是少年的儿子,好将他培养成人,继承他的事业。他向自己的哥哥提出这个想法,被应允带走我爷爷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爸爸戈宝权。因此公振爷爷既是我叔爷也是我亲爷。

在我小时候,爸爸常讲起东台的河,说他少年时常去南城河边看那些高飞的风筝。他多想像一只高飞的并且是断了线的风筝飞向远方,去求学,去见世面。那时他一心

沉浸在这个理想里,可没有飞翔的翅膀。公振爷爷过继爸爸为子是爸爸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公振爷爷为爸爸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带他去上海入学大夏大学,培养他做新闻记者,送他去莫斯科工作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兼任上海《新闻周刊》、《世界知识》和《申报周刊》特约通讯员。爸爸在公振爷爷的耳濡目染下,一生体现公振爷爷勤奋好学的精神,在人生历程上做出一个又一个成就。1949年后,爸爸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回国,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等职。在整个期间,他从未间断搞俄国文学翻译。他最出名的、被中国读者热爱的译作是《普希金文集》。文革结束后,他在各国得到过许多文学翻译奖和大学的荣誉博士。有报道这样说:“在世界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戈宝权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1988年秋,爸爸荣获他一生中最高的大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这个勋章在中国仅有三位翻译家获此殊荣(曹靖华 1987年8月、戈宝权 1988年8月、巴金 1990年8月),表彰他们向世界介绍俄国文学的贡献。可惜的是,公振爷爷45岁英年早逝,没能看到爸爸后来的成就。我的宝树叔叔,也就是公振爷爷的独子,在年青时选择物理为专业,他在1986年写的一篇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我没有能继承父亲的事业,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我可以说是个不孝子。幸亏我的堂兄戈宝权一直跟我的父亲很接近,一方面由于年龄,一方面由于专长和志趣,他实际上继承了我父亲的事业,从而减轻了我的内疚。”是公振爷爷将爸爸从一个小县城少年培养成著名翻译家和外交家。我常对爸爸说,公振爷爷要是能看见他对您的精心培养获得了成功,该多高兴呀。

爸爸的学问是用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就是说他永远在学习,而且是每时每刻、分秒必争,已到了凡人不可想象的地步。他出门一定要在腋下夹本书,不论是等公共汽车,还是等人,还是在饭馆等上菜,凡是有一点儿零碎时间他都要看几眼。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形象,亲友都说他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呀。我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妈妈郑兴丽,年青时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经常巡回演出,所以周日带我出去游玩的任务就落在爸爸身上。即便是带我去公园玩,他也要看书。当我打秋千或玩滑梯时,他就坐在长椅上看书。我大声叫“爸爸”,想让他看我的秋千滑梯“技巧”,他就笑眯眯向我招招手,然后又低下头看书。有次我很不高兴,干脆跑过去问“你在看什么书呀,这么有意思?”他举起一本砖头厚又发黄的书,认真的说“很有意思的,是《俄语词典》。”去小学开家长会也经常是爸爸出席,如果会议还未开始,他坐下打开本书就

来,以致同学们的家长都记住他。当时爸爸送我去被戏称为“北京贵族小学”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上学的孩子几乎是清一色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人家的爸爸不是穿中山装就是军装,我爸爸却穿西服打领带,腋下夹本书。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的老革命爸爸说戈宝权没人记不住呀,这样的家长全校独一个。小学时爸爸带我去北戴河过暑假,一住下就问城里的图书馆在哪里。因此不论去哪里度假,桌子上总是摆满他借的书,他晚上总是在看书。虽然我很希望爸爸能跟我玩,但我对这样无时无刻不读书的爸爸也不得不习惯了。我就改成他读书,我在他身边玩,以至于很多童年的时光是在他书房度过的。我们之间的读和玩非常默契,我围着他的脚用积木搭“公园”,又是亭子又是九曲桥。他离开桌子时,总是很小心地抽出双脚,等回来坐下时再很小心地把双脚插进我的“公园”。快上中学时,我突然迷上了划船,于是周日多是去北海公园。爸爸很认真地不厌其烦地教我划船,但自我学会后,爸爸就不是带一本书了,而是好几本书。我在湖上泛舟,爸爸就低头读书。这种读书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包括“文革”期间。他对自己的译文精益求精,为一个词汇要去图书馆借好多书,然后一本本看,做笔记,力求用最准确最贴切的中文来表达。他所有的译著都多次再版,每次都有改动的字词,爸爸做学问的态度就是极为严谨认真。

爸爸特别爱书,一生不停地买书藏书。小时候和他去的最多的是北京东四八面槽的旧书店,虽然我们搬了几次家,都离这家书店不远。他一进去就要待一两个钟头,我就在店里乱转。那时的八面槽旧书店还兼卖旧家具和古董,我就在那些镶罗甸的红木家具中玩那些古董和那些老式手摇唱机,听几张78转的老式胶木唱片。然后我们就坐三轮车回家,因为脚下要放购买的书。如果书太多太沉,爸爸就让我坐车上,他自己跟着走。家里的书越来越多。最早我们住在王府井的东交民巷,爸爸的书已放满一面墙的书架。等我们搬到六部口时,已是三面墙的书架。当时我们住的是两层的旧租界洋房,和另外一家人合住。我们住一楼,大而空旷,应该是当年洋房的客厅兼舞厅。爸爸的书架派上用场了,当隔断屏风用,隔出了卧室、书房和客厅。之后搬到九条文联大院,房子小,单位特给他一间楼里的储藏室,他用书给塞得满满的,进去几乎看不见顶棚的灯泡了。最后一次是搬到学部为高级知识分子新盖的东单附近的干面胡同单元楼。帮爸爸打包,感叹他打包的高超能力,就是所有的书都用牛皮纸和麻绳扎得方方正正,有如精美礼盒。爸爸说,他爱书,每本都是他的宝贝,要小心对待。因此运到新家后可以说是“毫发无损”,连角都没折。新家大而宽敞,爸爸的书可以摆开了,屋里的墙面一半是书架,充满书香气息。一个朋友去我家激动得一遍遍大喊“这就是我想象

中的基督山伯爵的家呀!”(指法国文豪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中所描写的)。这么多书,爸爸却了如指掌,只要问起某一本书,他马上就能从书架上抽出来。来美后我给朋友寄书或礼品,他们总惊讶地说从没见谁能包这么好,问我是怎么学的。我开玩笑说是“祖传秘方。”爸爸的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的收藏成果,1986年,他毅然将这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1988年,爸爸又将两千册藏书送给他家乡的东台市图书馆。东台市把爸爸的赠书视为珍贵文献,建立了“戈宝权图书馆”,并在图书馆大厅安放了爸爸的铜像。

公振爷爷曾学习多门外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40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了俄语。受公振爷爷的影响,爸爸学习外语也很努力。在上海大夏大学时,他主修英语,选修法语,旁听日语,并同时掌握这几种外语。1932年赴苏前,爸爸自学了俄语,之后在苏联生活的年代中不断在俄语上深造。爸爸对外语很有天赋,过目不忘,融会贯通。在之后的年代中,爸爸还自学并掌握了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和世界语。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世界语的活动,总是告诉我如果人们都能用世界语交流,不但会减少沟通问题,还能用一种语言原汁原味地阅读文学作品。他似乎要走向超越各种语言的更高境界,及致力于一个语言的大同世界。他一次次教我在学好一种外语后一定要用原文读原著,说任何高超的翻译也不能体现原文所体现的全部韵味。这点在我学外语后真实地体会到了,那种原汁原味用另一种语言是无法百分之百转达的,尤其是成语和俚语。同样,写得绝好的中国文学,译成外语后有些地方也显得惨白。我学习外语后再去看爸爸译的《普希金文集》,才意识到为什么这本书那么让读者喜爱。不少读者对我说在所有译普希金诗歌的人中,你爸爸译得最好。爸爸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把整个诗歌的意思融为一体,按中国诗歌的韵律再写一首诗歌,而原文中所有的东西还准确不落地表现出来。这才想到为什么他为译一首诗歌要查询那么多词典和材料,就是为了弥补两种语言互译时韵味的损失。同时也想到他教我中文不好,外语也不会译好,因为你没有完好能力用中文转换和表达。这才明白他的美丽流畅的译文是具有功底的中文重写,避免了僵硬的中国式外语。

除了外语,爸爸对很多事物都会感兴趣,一旦有兴趣就要研究个透。“文革”中他在河南明港干校时对天文感了兴趣,买了架天文望远镜,每晚在院子里看星星。床头也是各种天文书。我去看他,他老给我讲宇宙星系,头头是道,还给我看天文镜并做各种演示。当时有个同事还给他画了幅漫画,题名《戈宝权看星星》,把爸爸认真的神情表现得栩栩如生,一时传为美谈。



亲友们都说爸爸对我宠爱过分，他确实是这样，但他对我的学习却抓得很紧。从小学起，他每晚都要检查我的作业，并按老师要求签名。他除为我订阅了《小朋友》这份中国儿童画报外，还订了当时的《苏联儿童画报》，每月从苏联寄到家里。虽然我看不懂，但那是一扇窗子，让我看到和学到当时在中国看不到的文化习俗和知识。爸爸有时间会和我一起看，并给我讲解。我特崇拜他，说“爸你怎么一看这俄文就能说出中文来呀”。我想后来我选外语做专业，兴趣应该是那时培养出来的。我第一次看到圣诞树是来自《苏联儿童画报》，那是还在上幼儿园，爸爸给我讲圣诞树的故事来历和庆贺习俗。一个寒冷的圣诞前夜晚，西服革履的爸爸竟满头大汗地拖进一棵小枞树。他说在东交民巷街心公园看到工人不小心锯断了一棵小枞树，问可以拿走吗，得到允许后就自己拖回来。他和妈妈将枞树倒挂在顶灯上，妈妈在树上扎了些纸花和彩带。爸爸慈爱地说：“好了，现在你可以叫小朋友来庆贺圣诞啦”。我和小朋友们高兴地手拉手在圣诞树下以走圆圈的形式唱歌跳舞。多年后，童年好友们仍记得这棵圣诞树，说那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第一棵和唯一的圣诞树。而说到我们为什么会手拉手在树下唱歌跳舞，他们说都是在你家《苏联儿童画报》上看到后模仿的呀。圣诞前夜我不睡觉，因为爸爸说圣诞老人会带礼物来。他在我床头放一只长筒线袜，说圣诞老人会在袜子里放满糖果。当然我没有一次能坚持住不睡，但次日醒来发现装满糖果的袜子，就高兴得大叫“圣诞老人真来过啦”。再大些才知道这圣诞老人就是我爸。爸爸不厌其烦地给予我有关外国文化和习俗的教育，并找寻任何可得的物品给我展示当时不可能看到的东。西。这些教育和展示使我后来在学外语时受益非浅，点滴知识奠定的基础使我只需要学习外语词汇，而不用再花时间去搞懂一些外国文化的渊源和习俗。

我们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是逛王府井大街，而当时我最喜欢的店就是新华书店，里面有儿童书籍和画工精致的小人书。爸爸答应每个月给我买两本，以至于我能好好消化，而不会狼吞虎咽。慢慢我就攒齐了全套画得极好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和类似王叔晖画的京剧风格的《生死牌》昂贵大画册的其他精美书籍。我小桌的抽屉放不下了，爸爸说，我们买个小书架吧，给你也搞个小书房。到“文革”前我已有100多本书，“文革”中抄家，使我的“藏书”全军覆没，也粉碎了小书房之梦。“文革”中爸爸总说，不要浪费时间呀，不要消沉，读些书，多学些东西。我说学校都停课，前途茫茫，读书还有什么用呢。爸爸对当时的“读书无用”论不以为然，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昌盛，靠的是科学技术、丰富的文化知识，看书能增强人的修养和素质。他爱看爱学，就怕我不爱看书和不爱学习，这时就想方设法鼓励我看书。如果我说哪种书好看，

他就拼命去找。我曾喜欢上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作品，她寥寥数字却显笔触的细腻和她惊人的观察力，让我在家里看得哭得成了泪人。我告诉爸爸就找类似这样的书给我看，结果他翻箱倒柜好几天，找出十几本他认为类似、可我看了都不是很类似的。当时他属于“牛鬼蛇神”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勒令烧锅炉，双手被煤灰搞得已洗不出皮肤的颜色。我在家将他的手泡在热水盆里，用刷子和肥皂刷洗并涂上当时防裂效果最好的哈喇油。但他再去上班用煤用水，再加上风吹，手又皴裂了，裂开的大口子里都是煤黑色。当他用黑黑的满是裂口的双手捧给我这些书时，我心酸得要哭也由衷的感动，想就是为了爸爸，也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看书。

我上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爸爸欣喜若狂。那时还在“文革”中，我拿回的第一本英语书是老师偷偷给我的英国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简写本。对爸爸自然是小儿科了，但他拿着这本小书开心极了，一段段朗读起来，还不断地笑，快乐得像个孩子。可以看出他真正开心的是女儿有书读了，而且他把女儿培养和带上爱读书和刻苦学习的正道。他说：“以前老想给你搞个小书房，没搞成。现在你是大学生了，真该给你搞个书房了。我们买些书架，我来给你买书，慢慢的你的书就多起来了。”我说：“真的呀，太好了，我们说干就干吧。”于是父女俩开始用卷尺丈量我住的卧室，商量书桌书架怎么摆。那一阵的家里真是充满欢声笑语。但是不久爸爸再婚，书房的计划第二次并永久地被粉碎了。

当时大学的英语课本都是火药味十足的文革语言，学的词汇大都不是生活中能用的，至今还确实证明，离开大学后我几乎没有用到过这些词汇。这在当时很困扰我，我告诉爸爸并问该怎么办。爸爸说“文革”前有八本许国璋编写得非常好且内容全面的英语课本，据说许先生把这些课本编好后还亲飞美国，找美国语言专家确认和订正过。他决定去我们钟爱的八面槽旧书店碰碰运气。不久他给我拿来六本旧旧的、有的都卷了边儿的许国璋课本，说：“把书店都翻遍了，翻了好多次哦，只找到六本”。想到老爸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的找书，我的心都被扎痛了。许国璋课本绝对是我学英语中的一个突破，尽管我得学两份英语了。白天学“文革英语”，下午和晚上躲到图书馆学“许国璋英语”。在没人教的情况下，自学这些课本相当吃力，但我把六本课本全部学完，我的老爸是我最大的动力。

爸爸期待我顺利成长，我每一个进步都让他感到欣慰和喜悦。我去英国读了英语硕士，又到美国读了工商管理硕士，而且两次均拿到全额奖学金。爸爸每次来信都热情洋溢，说他有多么高兴和兴奋，为我有那么骄傲。我说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比起公

振爷爷和您,我没做出任何壮举。爸爸说:“不要这么说,你在你的环境和条件下已经做得最好了。”爸爸一直因为自己“文革”的境遇对我有愧疚感,为此我当了十年的狗崽子,被发配下乡插队。因为他的“问题”,我上学、工作甚至谈恋爱都到处受阻,阅尽世态炎凉。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婚姻不顺,给我造成的心灵创伤深感内疚。我人生中的风雨是我自己无法控制的,但我要感谢他在“文革”中给我的很多启发和语重心长的谈话,后来有机会学习时才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和财富的意义,那就是他经常说的“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喽”。

爸爸走了12年了,但我每当看书就想起他。现在看书有多种渠道,在网上既可阅读也可查询,非常方便。我很喜欢知识性的东西,什么都看,还要搞个究竟,查十几个网站去证明一件事或一个词,有时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那个在干校看星星的老爸了。我现在虽不至像他那样无时无刻地看书,但出门是要带书的。有时找不到什么好书,拿本《中国成语词典》也要在飞机上看看,这时就会想起小时候我笑话爸爸在公园看《俄语词典》的事。来美前我看着行李箱,想戈家人出门哪有不带书的,怎么也得带两本吧,就顺手拿了两本塞进去。后来拿出来看自己都惊讶,竟是爸爸的《普希金文集》和发黄了的1925年出版的公振爷爷的《新闻学撮要》。这两本书是我从小爱看和看了多遍的,常常沉浸在普希金优美的诗句里和随着公振爷爷去游历世界(书中有很多宝贵照片)。现在这两本老旧的书在美国的家里越显珍贵。我想这不是巧合,而是他们对我人生路程上的影响是精神上和永久的,使我自然而然就把这两本书带出来了。我会永远弘扬这种精神,像他们那样爱书和学而不厌。

2013年3月写于美国德克萨斯寓所

# 写在前面

孙 戈

记得2013年1月30日,那天正在深圳出差,接到著名翻译家潘庆舛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给华东师范大学写了封信,谈到了今年是戈宝权先生诞辰百年,希望能以此来激励学校师生学习戈宝权先生的治学精神。第二天学校就给他电话,1月31日到他家拜访,同时邀请我一起参加。当时前来的有党委、校办等部门领导与我们交谈,戈宝权校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由此展开,而其中重新出版戈宝权先生的《中外文学因缘》一书便是重要一项。

戈宝权出生于1913年2月15日,是我国杰出的外交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和文化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更是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先驱者。

本次重排和增补本是在北京出版社1992年7月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当时未收入的几篇遗文,其中有:《谢夫琴科和他的诗歌作品在中国》、《邹韬奋是怎样编辑〈革命文豪高尔基〉的》、《回忆同曹靖华同志相处的日子》、同时在附录中有:戈宝权先生“漫谈译事难”,戈宝权先生生平年表和戈宝权先生主要著作和译著的目录。

戈宝权先生一生勤于笔耕,给我国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比较文学留下了丰富的文字遗产,在这方面,不仅包括翻译作品,而且还有大量的随笔、特写与诗歌以及序跋,还有他费一生的努力,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尤其是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史和翻译史的研究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他关于俄苏作家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冈察诺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与中国的论文,以平实而朴素的文字,翔实而全面的求证、索引、考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尤其对《伊索寓言》的研究,花了他三十年的时间,这一切颇合乾嘉学风,那就是不轻易作结论,务求立足于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全面解决问题。他的这些论文已经成为我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从事中外比较文学研究时的必备的参考。

从七八十年代起,戈宝权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对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上,鲁迅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尤其是他关于鲁迅的《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的研究系列论文,既继承了中国乾嘉学派重视考据求证的学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充分体现了“论从史出”的优良学风。与此同时,他部分论文已被翻译成俄、英、法、德、西、葡、日、世界语以及中欧、东南欧等国的各种文字。

《中外文学因缘》,收集了戈宝权先生生前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些已经出版单行本就不再列入,有些内容类似的文字、还有些我们现在未曾发现的遗稿则未编入此书),《中外文学因缘》展示了他对这个领域研究的丰硕成果,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倡导他对研究的那种求本溯源的钻研精神。

附录中选用了他的《漫谈译事难》一文,则是戈宝权先生与读者分享了他翻译实践中的辛劳与甘苦,并以“译事难”指出了文学翻译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强调了译者的个人素养等问题,以此来勉励后学者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而生平年表(简略)和主要著作、译著则比较清晰地让读者了解戈宝权先生一生的经历与历程。

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特别要感谢的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画家高莽先生,在他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还为本书题签,在书写多遍后,挑选了他比较满意的一幅给我作为本书的扉页内容,这让我们深深感到他对良师戈宝权的感念之情;同时也要感谢著名翻译家潘庆舛先生为戈宝权先生的纪念活动和有关事宜所作的努力,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本书的出版;也要感谢翻译家姚以恩先生、法国文学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对《中外文学因缘》给予的支持和提出的宝贵建议;同时也要感谢宋晓岚女士给与的帮助,将她父亲高莽先生之前画的戈宝权素描等画稿扫描、传送给我们。

最后要感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校办、图书馆、校史馆,档案馆和华师大出版社及校友会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华师大出版社的朱文秋女士、曹利群女士和金勇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促成本书在戈宝权先生百年诞辰之年和逝世纪念日之际得以出版。

2013年4月于上海

# 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

韶光易逝，流年似水！今年年初我刚度过了七十五岁的生日，用中国的说法，我已是年逾“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人了。回想到我从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喜爱外国文学，二三十年代起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后来又专门从事研究外国文学的工作，因此我想来回顾一下我是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的。

## 一

我于1913年阴历正月初十（公历2月15日），生在江苏省东台县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人家。我的家庭很早就接触到新学和民主的思想，家里有不少藏书，记得其中就有邹容的《革命军》，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我们童年时最喜欢看的《点石斋画报》。当1911年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时，我们家最早表示了响应。我的母亲时常说：“光复那一年，我们家门口最先挂起了白旗！”

我的父亲戈曙东，多年来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我的叔父戈公振，从1913年去上海后就终身从事新闻事业，他们对我的教育和成长都非常关心。记得童年时，叔父曾送了一盒积木给我，他在盒盖里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这样两句话：“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尽管这盒积木早已散失，但他写的这两句话，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对我后来的生活、学习、工作和思想都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童年时，我在家乡读过四年的初级小学和三年的高等小学。由于从小非常喜欢书，家里的人都说我是个“书呆子”。我最喜爱看的儿童读物，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记得当时从这本刊物的新年特大号上，读到了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把它遗忘！当我10岁时，叔父回

过家乡一次,我请他到上海后买一套唐小圃编译的《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给我。不久我就接到他寄来的6本书,他在第一本上用钢笔写着:“宝权侄览,公振寄。23.3.28”。回想起来,这已是64年以前的事了,但我把这套书一直保留到今天。我珍惜这套书,不仅因为封面上有叔父的题字;同时还因为这套书为我打开了第一扇开向外国文学的窗户,更何况我最初接触到的就是俄国文学,而且还又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呢!

高等小学毕业后,我就进了由南通实业家张謇在东台创办的母里师范学校。这时我们家里订阅的报刊,就有《申报》、《时报》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在我当时读过的书中,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原名《心》、又名《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给我的印象最深。记得当时有一个在上海读书的学生,带回来一小网篮的书,我从他那里借到了一本《新诗年选》,还有文学研究会出的新书,如叶绍钧的《隔膜》、《稻草人》,冰心的《繁星》、《超人》等。我又从一个行商书贩那里买到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这样我就最初接触到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 二

1928年15岁时,我考进了上海大夏大学的预科三年级。记得初到上海时,我从《文学周报》上读到赵景深写的一篇介绍小泉八云的《几个中国鬼》的文章,发现其中有关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他未能查明,我当即写了信去。想不到这封信在刊物上被发表了出来,这可说是我写的第一篇多少与外国文学有关的文字了。

我从预科毕业后,又读了将近4年的本科,4年多的大学生活是在苦学中度过去的。这时期我如饥似渴地吸收文史方面的知识,阅读了大量的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我都非常喜爱。

在外语方面,除大学英语外,第二外国语我选修了法语,还旁听日语。我曾从英文的《金库诗选》中选译了拜伦、雪莱和罗塞蒂的几首抒情诗,发表在1931年出版的《大夏校刊》上;从托尔斯泰的故事集中翻译了《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刻讲出来》和《高加索的俘虏》,发表在同学编的刊物上。当时教法语的黄仲苏先生,使我们爱上了法国文学,还知道了罗曼·罗兰和他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认真地学习日语,是想有朝一日能到日本去留学,因为当时通过日文,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

我也有一个时期热衷于日本文学，读了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等人的作品。甚至还用日文翻译过一篇关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记，发表在和同学们合编的《戈壁》文艺刊物上。我也译过一些希腊神话，但未能发表。

记得那时我常步行到北四川路底内山完造开办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本出版的廉价本的《改造文库》的书，因此有好几次在书店里看见过鲁迅先生。1930年3月13日还在学校的礼堂里，听鲁迅先生作过一次关于《象牙塔和蜗牛庐》的演说。三十年代初，我又读到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和曹靖华翻译的《铁流》，这些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在我的叔父的鼓励下，我开始学习俄语。当从《俄语识字课本》中最初读到托尔斯泰写的《狮子和老鼠》等寓言故事，并能直接从俄文读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

当年我从大夏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时事新报》出版部当编辑，并开始为报刊写稿。我当时不顾自己的学识多么浅薄，曾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周刊，写过一系列的《名人及名著提要》的文字。记得先后发表的，有《托马斯·摩尔的生平及其〈乌托邦〉》、《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对话录〉》、《柏拉图及〈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及〈政治学〉》、《荷马与〈伊利亚德〉》、《荷马与〈奥德赛〉》。这些文章是用通俗有趣的笔法写的，后因我不久出国，这个计划即告中断，接着《新生》周刊也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

### 三

1935年3月，苏联邀请梅兰芳的剧团去苏演出，我当时不过才22岁，就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随迎接梅剧团的专轮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我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经常为国内的报刊写通信，还常到列宁图书馆和外文图书馆看书，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就在1935年6月30日，我在红场举行的体育大检阅时，第一次看见高尔基和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夫妇。当年11月22日，我又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到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参观访问。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我到工会大厦的圆柱厅去瞻仰过他的遗容，并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葬礼。当12月22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时，我又到苏联作家协会的大厅去向他的遗



体告别,193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的百年纪念,我先后参加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举行的各种活动,还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访问了他的故居和墓地。我这时最初翻译了普希金的诗歌作品,为巴黎的《救国时报》编了一期纪念普希金的特辑,还为国内的《文学》月刊写了长篇通信。在苏联的三年记者生活,对我来说在学习上是个丰收的年代。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在第二年初即经由西欧的德、法等国,从马赛乘船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3月我到了武汉,立即参加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之下的《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

在重庆时,我协助孔罗荪编辑的《文学月报》,并经常为《抗战文艺》和《中苏文化》等刊物写稿。我为《新华日报》翻译的爱伦堡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鼓舞和赞扬。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部署秘密到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了文艺通信社,并为茅盾主编的《笔谈》半月刊译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之后,方逃离香港,经九龙到了东江游击区。1942年回到重庆后,我仍在《新华日报》工作。这时我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的编委会,在1944年为茅盾翻译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进行了校订工作,1945年又同茅盾等人合译了罗斯金写的《高尔基》的传记小说,同一时期,我还为新知书店编了两套丛书:一是《世界文学丛书》,其中收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考纳丘克的剧本《前线》,我对这些译本都进行了审阅,并写了序文。另一套是《史诗丛书》,其中有李霁野翻译的格鲁吉亚大诗人罗斯泰凡里的长诗《虎皮武士》,我用郭沫若为我起的笔名“苏牧”写了序文。此外还编了一本亚美尼亚的史诗《沙逊的大卫》,可惜当时未能出版。

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期间,经常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与关怀,他鼓舞我要向研究外国文学的方面发展。他还亲自为我翻译的爱伦堡的报告文学作品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两本书题写书名。他的深情厚意,我至今念念不忘!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从延安来到重庆,我当天下午在红岩村就见到了毛主席。当周恩来同志介绍我同毛主席相见时,毛主席就对我说:“你是个俄国文学专家”。这就是说,我当时在翻译和研究俄国与苏联文学方面,已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了。